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发展观的范式转变

李洪慈, 王 宏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 发展政策和发展观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对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自由化改革和渐进式改革方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认识。在开放的时机、速度和次序方面, 盲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 以普适的政策框架推进改革是有风险的。在全球化进程中, 集中精力推进国内制度建设, 同时提高有益于投资、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流动的政策管理能力, 是开放经济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华盛顿共识; 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5)07-0069-02

1 发展观的范式演变

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相互作用, 发展的

值的比例大于 2%, 属于技术领先国, 引领技术潮流。我国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成为技术领先国。因此, 政府采购必须向本国具有技术优势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倾斜, 降低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 提高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

2.5 政府在制定和采用标准时要考虑优先采用本国企业的标准

德国和法国在 GSM 时期, 就通过国家制定利用本国企业的技术标准制定来发展本国技术。在标准制定和采用上有一种锁定(lockin)效应。如果一个或几个企业的专利成为标准, 则这几个或一个企业会由于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越来越强, 而没有成为标准的企业就会失去机会^[7]。以移动通信为例。我国在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上基本为零。在第二代华为等企业从农村做起, 逐渐掌握第一代技术, 由于第二代技术中国掌握较晚, 也失去了机会。在第三代技术标准的确立过程中有一家公司的技术有望成为电信标准, 那就是大唐电信的 TD-SCDMA 技术。由于前两

政策主张也由此处于演变之中。发展政策问题涉及对发展趋势的理解和对世界规范的分析。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明确政策

代我国的移动通讯买的是国外的设备, 我国移动通讯的设备供应商只能为外国企业生产一些简单的器材。如果第三代标准不能采用一部分本国专利, 我国移动通讯的设备供应商就很被动, 要进入就要交高昂专利费, 不进入就永远落后, 被锁定, 就只能生产简单设备, 即使生产出先进设备, 要么因为核心设备买的是国外的, 标准不同, 所以也不能采用; 要么因为设备已经投入, 更换的成本太大。如若这样的话, 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也不能赶超。但是, 国家制定标准时要注意不要使标准过于封闭, 过于封闭不利于技术的扩散, 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 [1] James M. Utterback, Fernando F. Suarez.: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structure[J]. Research Policy 1993(22): 170-179.
- [2] Rebecca M. Henderson, Kim B. Clark: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configuration of exi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框架。例如, 在看待某一发展问题时, 哪些要素应当包含在其中, 哪些应该排除在外。政策框架包含很多方面, 其中影响发展中国家

fir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 9-30.

[3] Clayton, M. Christensen, Richard S. Rosenbloom: Explaining the attacker's advantage: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nd the value network[J]. Research Policy, 1995, (24): 233-257.

[4] Rudi bekkers, Geert Duysters, Bart, Verspag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ic technology agreements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Case of GSM [J]. Research Policy 31, 2002. 1141-1161.

[5] Cusumano, M. Yiorgos, Mylonadis, Richard S. Rosenbloom: Strategic Maneuvering and Mass Market Dynamics: VHS over Beta[J].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Spring 1992, 75-98.

[6] Maichael L. Tushman, Philip Anderson: 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 (1986): 439-465.

[7] 段小华, 柳卯林. 2004 年中国科技竞争力剖析. http://industry.ccidnet.com/pub/article/c289_a180535_pl.html

(责任编辑: 曙 光)

收稿日期: 2004-12-15

作者简介: 李洪慈(1974-), 男, 山东沂南人,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宏, 男, 东北财经大学 MBA 学院硕士研究生。

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决策者在设计和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是从全球标准还是从本国国情出发^[9]。

在华盛顿共识出现之前,主流经济学对发展过程的解释和发展目标的评估限于一国之内。发展过程的关键环节是从对工业化国家改革次序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然后不顾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约束加以移植。发展政策也以实现国家目标为主。早期的发展政策的一些特征,如对自给自足和早期工业化的追求,对经济计划和国家控制的偏好,对外国投资的忽视等等,都源于国家主义、外援,以及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观念。尽管在发展的内涵和发展的措施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这些理念成为二战后各国和国际政策制定者的一些共识。20世纪50~60年代,发展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发展战略,如均衡发展还是非均衡发展、二元化发展过程,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有关以结构改革促进增长的观点受到来自于改革应兼顾社会目标,如收入分配、减贫和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等观点的挑战。事实上,这些争论强化了发展政策分析规范和解释的本国化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与主流发展政策分析不同的观点,主要来自基于拉丁美洲实践的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的规范分析是本土化取向的,但是分析的视角是全球化的。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者强调中心——外围关系在国家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除了东亚一些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并引发了对发展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强调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受到关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支撑的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国家发展论,成为8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策主张,后来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理论的参照框架是半全球化和半本国化的。它融合了规范分析的经济国际化和方法论的本国化来解释,即把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变化归因于本国的因素和政策。根据这一方法,决定发展的主要规范是新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这一规范涉及对自由市场,私人产权和个人激励及有限政府的承诺。根据具体情况有不同解

释,例如,20世纪80年代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得到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基本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的观点由于市场亲和(Market Friendly)观点的出现而有所缓和。市场亲和的观点继续支持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但认为国内经济自由化要有限度,同时,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要进行合理干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开出的药方,即以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广泛。这些政策建议包括: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对外开放;通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实现国内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

华盛顿共识主要体现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主要是在对拉丁美洲改革政策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威廉姆森没有明确提出华盛顿共识,但是认为当时经济学中有影响的传统智慧源于华盛顿,即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普遍的趋同,并构成了所有严肃经济学家智识的共同点(威廉姆森,1993)。因此,一般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视为发展政策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与之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表明,顺应新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会给国际社会及参与其中的国家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增进国家利益被狭隘地等同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个人经济福利。而与此相悖的政策,包括处于早期发展实践核心的一些要素,如保护幼稚产业,管制利率和信贷倾斜因有损于国家利益而被视为失误和非理性的国内政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持续增长也被视为符合自由主义规范。例如,在分析贸易自由化和促进出口方面,一般在小国模型的假设中可以忽略国际需求,即使假设外国市场存在,也不受一国出口的影响。实证分析上常见的方法是通过跨国回归分析,在国家经济变化的指标和一系列国家的变量之间建立数据关系,以证明外向型经济的动态效应。这一过程忽略了特有的历史,并假定过去存在的关系可以延续到未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中,全球生产系统更多地依赖贸易和资本流动。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多地被

用来解释自由化与良好的宏观经济相结合会发挥作用。一些国际组织认为,那些置身于全球潮流之外,不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会受到市场惩罚。反之,那些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由于可以吸引外资和技术,利用国际资本弥补本国的储蓄不足,则会从中受益。从这一角度讲,自由化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发展趋势归因于国内政策,因而分析上保留着方法论的国家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联合国发展项目(UNDP)可持续人类发展(SHD)方式;二是主要来自对拉丁美洲的新结构主义政策总结与对东亚发展模式理解的趋同而形成的潜在南方共识,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对发展的思考和发展实践。现行的发展政策分析更多地带有双边对话的特征。华盛顿共识与可持续人类发展观之间的冲突强化和保留了现有范式的一些要素,特别是规范的国际主义和方法论的国家主义。而华盛顿共识和南方共识之间的冲突则有利于削弱这些要素,增加了范式进一步转变的压力。

可持续人类发展观有别于华盛顿共识之处主要是主张一系列不同的价值。华盛顿共识关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采取自上而下,援助条件推动和外部专家引导的方式进行,而可持续人类发展观认为发展实践最终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提倡发展应当建立在普遍参与和保持发展中国家与援助捐赠国之间的公平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可持续人类发展的价值观强调不同的指标和评价体系,特别是人类发展的水平和减贫,这些措施强化了对短期绩效评估的关注。例如,以贫困的多角度指标代替简单的收入贫困化程度,从而为减少贫困注入了更多现实,但这是以牺牲对变革动态分析为代价的。

2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带有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强调财政金融纪律,主张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及国有部门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东欧及前苏联等转轨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和休克疗法失效促使理论界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化。

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实践的波折反复表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观在理论上存在缺陷,提出的改革议程也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理论和现实约束。

(1)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完备信息的竞争性市场中,价格包含所有的相关信息,而制度无须存在。这无疑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蕴涵在有效市场运行内的丰富信息,以及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有限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通病是市场失灵。华盛顿共识简单地认为,私有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增进效率,采取贸易自由化和取消政府垄断的措施可以促进竞争,而对增长面临的结构和制度约束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斯蒂格利茨(2000)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对增长很重要,但私有化作用就不那么明显。实际上,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亚于产权的重要性。缺乏竞争政策配合,私有化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2)次优理论。次优理论强调在经济领域的某一方面存在扭曲,就无法消除其他方面的扭曲。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单兵突进式的某一领域改革很难取得成效。以金融改革为例,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竞争可能降低银行的特许权价值,诱发银行部门的道德风险,过度偏好风险高的贷款组合,如果不及时加强审慎监管,有可能增加金融脆弱性(斯蒂格利茨,2000)。次优理论揭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注重改革和发展的次序和步骤。同样,缺乏有效监管,国有垄断企业的私有化可能会造成价格过高和总体效率下降。因此,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有长远目标,也要有中间目标,如有效的竞争和监管政策,稳健的金融机构,良好的制度建设和健全的社会安全网。

(3)价格自由化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必要条件。华盛顿共识认为,大爆炸式的价格自由化一定会带来资源有效配置。实际上转轨国家在价格自由化之后,出现产出下降的问题。有关理论研究表明,中国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钱颖一,2000)。

随着信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发展理论和实践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因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的不同制度特征。斯蒂格利茨指出,“发展不仅仅是经

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发展政策研究将更加关注社会文化制度、人力资源及经济金融各种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3 发展的政策取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把发展等同为趋同的过程,在政策制定上试图以自由化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政策主张,忽视了历史经验。实际上,提高应对伴随经济开放而来的外部冲击的能力比提高开放度本身更加重要。因此,政策制定者除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投资之外,还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

通过宏观稳定政策和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组合来实现增长和结构调整。增长为主的宏观政策力求抑制通货膨胀和削减财政赤字,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和鼓励资本形成。生产力发展政策涉及一系列与贸易政策相配合的措施,旨在调调整体经济及其内部各个部门的供给能力,帮助私人企业认识并获取竞争优势。以前瞻方式把握和利用相对优势,推进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和技术革新。这些政策包括科技政策、金融政策、人力资源发展、基础设施发展和产业组织政策及竞争政策。有效地实施上述政策要求在国家发展框架内建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这些政策将尽可能发挥私人部门的主动性而不是实行国有化,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采取行政干预。发挥政府在激发私人部门的精神和实现国家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这需要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在管制和公共财政方面进行改革。通过有能力务实的官员与商界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制定政策,就确立共同的发展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达成共识。但是政府必须明确任何支持和保护是以提高出口创汇和生产力为目的,而且是暂时的。政策也应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克服阻碍,主要是改善投资环境、解决市场缺失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克服技术和资本市场不完全和出口风险,以及提高部门竞争力等问题。

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分配问题。就是说,一个公平、合理和覆盖广泛的增长过程是广泛的财产所有权和有生产能力的就业机会的内在延伸。相关的政策包括:农业改革和农村发展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

融政策,基础广泛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开放对增长和结构调整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放过程中建立互补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短期国际资本开放的时机、速度和次序,取决于是否有利于本国的利益,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建立在完善宏观经济框架和金融体系稳健性及有效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资本流入应成为国内资源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避免因期限和货币的双重错配而危及国内金融稳定。

参考文献:

- [1]Gore,C.G.The rid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2000,Vol.28,No.5,789-804.
- [2]Radelet,Steve,and Jeffrey Sachs.The onse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Harvard University,1998. Unpublished.
- [3]Stiglitz,J.E.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form,in Economic policy reform:the second stage,ed.Anne o.Krueger,551-581.Chicago Press, 2000.
- [4]Stiglitz,J.E.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1998.
- [5]Williamson,J.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J. Williamson,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 [6]Williamson,J.Democracy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Development, 1993,21(8), 1329-1336.
- [7]Williamson,J.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visited.In L. Emmerij,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Washington DC: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7,48-61.

(责任编辑:汪智勇)

